

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何兹全 主编

认知中国：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
人群聚类分析与研究

李志英 罗艳 傅奕群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中国: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人群聚类分析与研究/李志英,罗艳,傅奕群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09583-9

I.①认… II.①李…②罗…③傅… III.①社会
调查—研究—中国—近代 IV.①D69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607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
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中国近世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认知中国: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
人群聚类分析与研究
李志英 罗艳 傅奕群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583-9

2012年 月第 版 开本 × 1/
2012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总 序

何 兹 全

中国社会史和政治史,是中国历史发展演变的主流,研究中国社会和政治史应该是研究中国史的主流。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有重视中国社会与政治史研究的传统。解放初期,侯外庐同志任历史系主任,为重视社会与政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以后多年在白寿彝教授的主持下,这一传统一直得到了保持并有所发展。

中国历史分期问题,迄今尚无定论,这是坏现象,也是好现象。这正好促使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者,对中国社会历史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开始发表了多篇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的论文。我在这些文章里提出了一些与别人不同的见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原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库”之一再版),2003年晁福林教授出版了《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两部书,在中国史学界都起到了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作用。

我指导的硕士生、博士生和博士后,很多学有所成,大部分成

2 总序

为高等学校和研究部门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他们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政治史的专著和论文。他们也是这套丛书的主要作者。

通观中外学术思想的历史,无论哪一门学科,往往走着—时重思想—时重材料,—时重整体—时重局部的发展路程。孔子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篇》),可以引申来说就是偏颇的为害。孔子高明!

中国社会史研究虽然时间尚短,但大体上说,也不免有走这种偏颇道路的情况。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一出生就是以社会史论战的面貌出现的,偏重理论;不久就出现《食货》派,被认为重材料。解放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自然是重理论的,其结果则是被目为走向教条主义。上世纪80年代后的社会史研究又出现重材料,重局部,重个别社会问题的研究的动向。

历史经验是值得重视的。任何—门学科都应当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不能偏重哪—方面。

理论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理论是研究深入中—点—滴积累下来的认识客观的能力。认识能力的不断提高,对客观的认识才—步步地深入。

因此,理论和材料的关系是相互为用。要两条腿走路,缺—条腿就成为瘸子。

自古就有这样—句话,说是“坐井观天曰天小。非天小也,所见者小也”。坐在井里看天,只能看到天的一部分,就说天小。不是天小,是你所看见的小。做学问,要宏观、微观结合。要能真实的看到整个社会,才能认识你看到那—部分社会和问题。研究任

何一点一面的社会,必须有全面的观点,认识了社会的全面,才能真正认识你所见的部分。

自古以来,研究学问,往往出现这两者的偏差,不是重宏观、重理论,就是重微观、重材料。

我们编撰这套丛书,要重视历史上所走过的弯路,重视这种偏差。一本书也可能材料多些,也可能理论多些;一本书可能重在宏观,也可能重在微观。但我们希望整套书,是在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思想指导下完成的。这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的正路,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我们编这套书的指导思想。

上世纪 80 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海外商品经济、技术和资本涌入中国,西方国家的学术、史学思潮和著作也涌入中国。辩证唯物史观一时有进入低潮的趋势。这是学术因素以外的人为原因造成的。辩证唯物史观还有极强的生命力,是先进的。

我们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辩证唯物史观推动中国社会和政治史研究,我们坚持理论、材料并重,宏观、微观并重的道路,避免偏颇,并决定从《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做起,以后再逐步扩展,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推动中国历史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为中国学术走向世界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社会调查溯源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出现	20
一、社会调查探源	20
二、西方现代社会调查的兴起与现代社会调查 在中国的产生	42
第二章 清末以来中国政府的社会调查	71
一、清政府预备立宪与大规模社会调查的开展	71
二、北洋政府巩固统治与社会调查	104
三、南京国民政府规模宏大的社会调查	130
四、民国时期政府调查论析	155
第三章 各类学者与社会调查	161
一、社会学学者群及其调查	161
二、其他学者的社会调查	221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调查	244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调查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244
二、马克思主义者社会调查的特点	274
三、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基本工作方法	300
第五章 近代企业家群体与社会调查	311
一、民族工商企业家群体及其进行的社会调查	312

2 认知中国: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人群聚类分析与研究

二、金融家群体及其进行的社会调查·····	344
三、华资银行的信用调查·····	361
四、中国征信所的出现与信用调查的制度变迁·····	396
第六章 近代各类在华外国人的调查活动·····	402
一、在华外国人对中国自然、社会等情况的调查·····	404
二、以满铁为代表的日本在华侵略性调查·····	411
三、在华基督教团体的调查活动·····	420
余论·····	432
参考文献·····	447
后记·····	459

绪 论

中国现代意义的社会调查产生于晚清。其后社会调查不断发展,调查报告数量不断增多。至清末,由于留学生的大力推动和清政府举办新政的需要,社会调查成为了官方、民间均认可的了解社情、国情的有效手段之一。进入民国以后,社会调查仍然不断受到追捧。在学术层面,由于许多社会学学者不断将国外的学术理念输进中国,并亲身践行社会调查,推出了许多高质量的社会调查报告,推动了社会调查的学术进展,进而推动了中国社会调查整体质量的提升。在受众层面,清末的社会惯性延续了下来,社会各知识阶层继续保持了对社会调查的高度热情。各类知识分子均以极高的热情从事社会调查。官方也保持了对社会调查的高度认可,大量官方主持的社会调查不断问世,甚至是否进行社会调查竟然成为了官方机构的政绩表现之一,与社会调查相关的社会学也成为了显学。

热衷社会调查是清末以来中国社会中突出的社会现象之一,其参与人员之广泛、调查问题之多样、调查报告数量之巨大、持续时间之长久,为近代中国史上各种社会活动所罕见。这样特殊的历史现象理应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任何引人注目的历史客体通常会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焦点。因此,清末以来的中国社会中大

2 认知中国: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人群聚类分析与研究

行其道的社会调查,理应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是,很长时间以来,社会调查并未在历史研究中受到应有的重视,历史学者只有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才想起社会调查,只是将社会调查作为史料来运用,并未对社会调查本身产生兴趣,也并未在头脑中设问:为什么清末以来中国社会的各类人群对社会调查有如此高的热情?为什么人们愿意投入如此多的人力、物力和精力进行社会调查?社会调查究竟给人们带来了哪些裨益?对社会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社会调查背后反映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其深层原因究竟何在?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和社会调查的盛行,学界重新发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调查,并开始了对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发掘和研究。1988年,傅衣凌先生发表了《社会调查在历史研究上的作用》一文,率先开始了对社会调查的研究。文章提出,中国古代即存在社会调查,并将司马迁等人的实地考察、口头采访等均列入社会调查范围。文章强调了社会调查的重要史料作用,强调了社会调查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史学工作者应以更广泛、更深入的眼光来搜集资料,积极加强与其他学科的有机联系,充分发挥社会调查的重要作用,扩大史料范围和研究视野,促进历史科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下去。傅衣凌先生的文章犹如报春的梅花,预报了学界对社会调查的深入研究即将到来。此后,对社会调查的研究不断增多,至本世纪初出现了研究热潮。

学界加强了对社会调查的资料整理。近年来,在李文海先生的主持下,经过多方的搜集、整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于2004年

冬至 2005 年夏整理出版了《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①，收录了文献 193 种，其中包括书籍、论文以及一些手稿和油印本。全书采用丛编的形式，按内容分为十卷，包括：文教事业、乡村社会、宗教民俗、城市（劳工）生活、底层社会、社会组织、婚姻家庭、社会保障、人口、少数民族等方面。丛编收入的社会调查涉及的区域十分广泛，覆盖了全国大部分省区，是民国时期社会有识之士对转型期中国社会问题关注和思考的结晶。这套丛编的出版成功地解决了调查材料零散的问题，不但为学界了解研究民国社会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也为学界对近代社会调查进行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目前丛编第二编已经出版，第三编也在编纂中。中国共产党是近现代以来积极主张进行社会调查的重要社会群体之一，对此学界也早有关注。《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②收录了毛泽东在苏区进行的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是研究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的基本材料。马克思主义者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等人于《解放前的中国农村》^③一书中专辟一辑《农村调查卷》，介绍了农村调查的方法，并收录了丰富的农村调查资料。

在近代中国数量巨大的社会调查中，关于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占了很大比重。曹幸穗在《民国时期农业调查资料的评价

①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其中文教事业卷、人口卷、社会保障卷、宗教民俗卷于 2004 年出版，乡村社会卷、社会组织卷、底边社会卷、少数民族卷于 2005 年出版。该丛书的二编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先后出齐。

②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③ 陈翰笙、薛暮桥、冯和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5—1989 年出版。

4 认知中国: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人群聚类分析与研究

与利用》^①一文中提出,民国时期的农业调查资料,在今天可资利用的民国时期农业史研究资料中,数量最大、价值较高。尽管调查主持者的主观动机和出发点不同,调查方法和调查内容的侧重点也不同,但这类调查仍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基本上都采用了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一般原理和研究方法,包含了某些科学成分,这与民国之前的农业经济史资料有着本质的区别。

另外,台湾方面也出版了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有关资料。萧铮的《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②一书,收录的主要是上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地质学院的学生对全国19省市180余县市土地问题的调查和研究报告,共有论文166篇,调查报告178篇,是研究土地和地质问题的宝贵资料。秦孝仪主编的《革命文献》^③丛书中收录的调查统计也十分丰富,在农林建设、内政统计、实业等方面均提供了大量资料。

在学理研究方面,学界对近代中国社会调查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关于社会调查在中国产生的起点问题,牟永如《社会调查真始于民国吗?》^④一文中对社会调查在中国兴起的时间进行了探讨,从调查宗旨、内容、方法各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近代中国社会调查早在清末就已经兴起。中国人民大学李章鹏的博士论文《现

① 曹幸穗:《民国时期农业调查资料的评价与利用》,《古今农业》1999年第3期。

② 萧铮:《民国二十年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版。

③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1987年陆续出版。秦孝仪另外还主编了《中国农民银行四川省农村经济调查报告》,由台北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于1985年出版。

④ 牟永如:《社会调查真始于民国吗?》,《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代社会调查在中国的兴起》，对清末社会调查进行了详细梳理，该文利用《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2卷）对清末社会调查的数量、类型及调查机构等做出了比较精确的统计，从宏观上勾勒出清末社会调查的总体轮廓，并重点分析了清末社会调查的起始时间、特点及现代性问题，纠正了以往认为中国社会调查始于民国的传统认识。李章鹏的《清末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刍论》^①一文指出，清末调查受日本影响较大，与统计学关系较为密切，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调查主题和目的均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清末的社会调查已具有某种现代性了。孙涛的《中国早期留日学生的社会调查实践》^②一文论述了留日学生对中国社会调查的贡献。文章认为，留日学生的社会调查实践，宣传了进步思想，开创了严谨务实的学界风气。陈勇在《清末政府统计机构的设置及其调查活动》^③中分析了政府统计机构的一系列调查活动，并强调清政府的调查活动为民国调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张勤、毛蕾的《清末各省调查局和修订法律馆的习惯调查》^④对清末习惯调查开展的原因、各省调查局和修订法律馆的习惯调查等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通过制度和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考察清末社会调查，有助于深入挖掘其背后隐藏的政治、文化、社会变迁历程。

对于民国时期社会调查的研究，涵盖了政府的调查和社会学

① 李章鹏：《清末中国现代社会调查肇兴刍论》，《清史研究》2006年第2期。

② 孙涛：《中国早期留日学生的社会调查实践》，《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③ 陈勇：《清末政府统计机构的设置及其调查活动》，《调研世界》2001年第4期。

④ 张勤、毛蕾：《清末各省调查局和修订法律馆的习惯调查》，《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学者的调查等方面。马敏、陆汉文的《民国时期政府统计工作和统计资料述论》^①一文对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统计调查进行了梳理,对统计机构的设置、统计调查的方法以及统计调查报告的种类均做了详细分析和和深入论述,认为政府部门大体上能够按照严格而科学的统计调查程序进行调查,因而调查质量较高。山东师范大学任伟伟的硕士论文《南京国民政府社会调查研究》对国民政府在 1927 年至 1937 年所主持的社会调查进行了研究,文章以工业、农业、人口三方面的调查为例,具体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调查统计工作在各个行业中的展开,综合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社会调查,指出了其成就及不足。朱浒的《燕大社会调查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实践》^②一文,全面介绍了民国时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主体进行的一批社会调查,着重指出,这批调查诞生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学科刚刚传入中国之际,真切地反映了这些学科扎根于中国的过程,从而构成了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实践的重要一环。

农村调查在近代中国的社会调查中居于重要地位,分析研究近代中国农村调查的论文不少。盛邦跃的《对卜凯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再认识》^③一文,分析了 20 世纪 20 到 30 年代两次大规模的农村社会调查的有关资料与成果,认为迄今为止我国理论界对

① 马敏、陆汉文:《民国时期政府统计工作和统计资料述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 44 卷第 6 期。

② 朱浒:《燕大社会调查与中国早期社会学本土化实践》,《北京社会科学》2006 年第 4 期。

③ 盛邦跃:《对卜凯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再认识》,《学海》2001 年第 2 期。

卜凯关于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认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李章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农村调查的历史考察》^①一文中对陈翰笙所做的农村调查进行了评价,认为他以精确的调查对中国社会性质做了科学分析,并在调查过程中形成了其调查的两个特点,即调查围绕生产关系而展开、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李金铮的《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②一文,认为定县农村调查有由狭及广的县级农村调查、学理与实用的双重目的、调查环境利与弊的影响、传统社会关系与先进调查方法的结合等特点。

学界还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调查进行了不少研究。研究最多的是毛泽东的调查活动。孙克信等人编著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③一书,分四个时期阐述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不少硕士学位论文都以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为题开展研究:华中师范大学邹巧灵的硕士学位论文《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比较系统地分析、论证了毛泽东的社会调查思想。她指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的典型代表。坚持毛泽东调查研究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对提高党的执政和决策水平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央党校胡伟雄的硕士学位论文《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从形成发展、主要内容、阶段特点等方面分析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理论,总结了毛泽东调查研究理论的基本内容,强调了这

① 李章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翰笙农村调查的历史考察》,《河北学刊》第26卷,2006年第2期。

② 李金铮:《定县调查——中国农村社会调查的里程碑》,《社会科学》2008年2月。

③ 孙克信等编著:《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一理论系统在当代中国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李方祥在《三十年代初苏区农村调查与社会学的中国化》^①一文中提出,30年代的调查成果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农村问题的正确认识,不仅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而且直接推动了30年代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进程。湘潭大学李慧的硕士学位论文《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社会调查活动研究》,从背景、概况、特点、阶段、历史意义等多个方面总结、分析了近代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在《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社会调查活动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探析》^②一文中,李慧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湖南新民学会成员的社会调查活动为切入点,论述了早期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活动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社会调查活动特点探析》^③一文中,李慧分析了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的社会调查活动,认为这些活动的特点是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注重对国外情况的调查借鉴;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问题,侧重对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抓个案、要案,重视对典型事例的调查;有社会调查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鲜明特征。

目前学界对社会调查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调查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的研究主要还是分类式

① 李方祥:《三十年代初苏区农村调查与社会学的中国化》,《党史研究与教学》第187期。

② 李慧:《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社会调查活动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探析》,《党史文苑》2006年第12期。

③ 李慧:《湖南早期共产党人社会调查活动特点探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7年第7期。

的、分期式的和分项式的。有的是对某一类社会调查进行研究,如对农村社会调查的研究,对统计调查的研究,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调查的研究等;有的是对某一时期社会调查研究的,如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调查的研究;有的是分项式研究,如对学者的社会调查的研究,对政府的统计调查的研究等等。但实际上,上述各类、各种社会调查,在时间上是交织的,在空间上是共存的,他们共同在相同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似乎相同的社会调查。但是,如果深入内里就会发现,不同的人群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并不一样,调查理念也不一样,调查方式、调查手段也存在巨大差异,对待社会调查结果的态度就更加不一样。因此,非常有必要从不同人群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的社会调查进行比较和研究,以此深化对社会调查的研究。目前,对社会调查进行人群聚类分析的文章笔者所见仅有一篇,周沛在《南京大学学报》发表《毛泽东农村社会调查与职业社会学家农村社会调查分析》^①一文,从聚类对比的角度,对上世纪 20 至 40 年代毛泽东的农村社会调查与职业社会学家的农村社会调查进行了多视角的对比分析,指出二者调查的立场和目的不同、调查方法不同、所运用的理论不同、最终得出的结论与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同。作者认为,这些不同是由观察问题角度的高低、分析问题所采取的理论方法科学与否决定的。文章还分析了毛泽东农村社会调查对社会学的贡献以及职业社会学家农村调查在总体上的非科学性。针对学术界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片面追求学科性的倾向,

^① 周沛:《毛泽东农村社会调查与职业社会学家农村社会调查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